

论电影喜剧

亚力山大·洛夫等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論 电 影 喜 剧

(苏联) I··亞力山大洛夫等著

李 溪 桥 譯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57·北 京

內容 提 要

电影喜剧是一种最为广大人民所需要和喜爱的影片样式。本集收集了苏联“电影艺术”杂志上近年来所發表的有关电影喜剧的五篇重要論文。苏联著名喜剧电影导演Г·亞力山大洛夫在“論电影喜剧”和“古典作品的傳統与喜剧片”中論述了有关电影喜剧的特性、苏联电影喜剧的發展道路以及如何向民間創作、向俄罗斯古典作家和苏联偉大作家學習的問題，并对果戈理、高尔基、馬雅可夫斯基所創造的卓然風刺形象作了相关的分析。捷克斯洛伐克电影理論家З·波得斯卡尔斯基的“論喜剧的表現手段和喜剧的誇張”一文，则論述了喜剧的特殊表现手段——喜剧誇張的本質，以及在电影中利用这些表现手段的可能性。苏联著名喜剧演員И·伊林斯基的“再来談談喜剧电影”一文，从演員的角度論述了有关电影喜剧的創作問題。此外，苏联电影批评家Р·尤列涅夫的“艰难的道路”一文，評論了近年来苏联各种不同类型的喜剧影片的成就和缺点，其中着重地分析了“忠实的朋友”和“兵士伊万·布洛夫金”等优秀的喜剧影片。这个文集对于我們研究电影喜剧的創作問題，是很有帮助的。

論 电 影 喜 剧

亞力山大洛夫等著

李 溪 桥 譯

*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單金魚胡同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89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發行

*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張 $3\frac{5}{8}$ · 字数 88,000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200册 定价(7) 0.40元

统一书号：8061·59

目 次

- 論電影喜劇 Г·亞力山大洛夫(1)
古典作家的傳統與喜劇片 Г·亞力山大洛夫(22)
論喜劇的表現手段和喜劇的夸张 З·彼得斯卡爾斯基(41)
再來談談電影喜劇 И·伊林斯基(65)
艱難的道路
——論近年來的電影喜劇 Р·尤列涅夫(79)

論 电 影 喜 剧^①

苏联人民艺术家 Г·亞力山大洛夫

在我們的銀幕上，至今還沒有出現新的喜劇片。这就是說，我們的電影藝術至今還不能滿足那些非常喜愛喜劇樣式的作品、想念着他們、渴望着看到它們的千百萬觀眾的要求。

党和苏联政府現在提出了一個任務：急速增加為廣大人民所需要的产品的出產量。這難道不正是意味着應當急速增加為我們觀眾非常需要的喜劇片的出產量嗎？

但是，在增加為廣大人民所需要的产品數量的同時，党和政
府也要求提高产品的質量；苏联人民所製造出來的一切物品都應
當是質高而美觀的。這難道不是意味着電影喜劇——最為廣大人民
所需要的一種樣式——應當是有趣的、引人入勝的，並且，不用說，
應當是引人發笑的嗎？

我們需要很多這樣的喜劇。這就使我們有責任一次又一次地來談談與創作喜劇作品有關的一些問題。

很多劇作家和某些電影導演聲明，他們不在電影喜劇領域中工作是由于對喜劇電影劇本所提出的要求不明确，或者，是由于所提出的要求過多，而又自相矛盾。因而在談論喜劇時，要先來確定那些應當並且可以向它提出的要求。

① 本文原來的題目為“談談至今還沒有出現過的喜劇”。——譯者

苏維埃的电影喜剧究竟应当是怎样的呢？

这个问题要求有一个具有理论根据的答案。为了做出这个答案，应当极其细致地分析和研究我们在电影喜剧领域中所创作出来的一切好的和坏的作品，总结电影喜剧大师们的创作经验，清除根本有害的东西，指出那已经发现到的新的、先进的、有价值的东西的发展道路，预先避免可能重犯的错误。

这些都是理论家的事情，难道还不清楚吗？

但是，电影方面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在我们这里所处的境况，几乎比电影喜剧本身还要来得更富于戏剧性些。因此，我们这些曾经从事过、目前正在从事着或者想要从事喜剧创作的人们，就不得不亲自来总结自己所做过的一切，并设法来说明喜剧的规律，寻找出这一复杂而重要的创作部门发展的道路了。也许，正因为这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只由实际工作者，即编剧、导演和演员们来解决，所以至今还不能完全解决摆在我面前的那许多问题。因为那些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解决了这一样式的实际问题的艺术家，他们发表的意见只能作为概括和结论用的材料，这些材料是很宝贵的，却不能代替我们非常欠缺的那些理论上的深刻研究。

本文并不妄图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本文作者只抱定一个小小任务，就是来讲讲由于准备摄制新的喜剧片而在他脑子里浮现的一些念头，交换一下个别的想法和意见，同时认为，这样做对于理论家们可能也有一些益处。

* * *

苏维埃的电影喜剧究竟应当是怎样的呢？

首先，喜剧应当是喜剧，这就是说，它应当具有苏维埃的内容，用我们的世界观来解释现实；它应当能引人发笑，使观众得到满足，因为正常的笑就是满足的表示。那些“讽刺的”、“抒情的”、“音乐的”等等形容词都是从属于“喜剧”这同一个名词的，而这个名词通常则意味着快乐的、可笑的、活泼的场面。

不可能把喜剧設想成悲剧性的东西。那种具有挖苦意味的、由于痛恨生活中的反面現象而狠狠嘲笑这些現象的諷刺作品之所以是喜剧性的，就因为它利用了笑这一武器。这种作品充满着肯定生活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就包含在据以揭露惡的那些崇高的原則和思想之中。

快乐的、可笑的、肯定生活的——这就是任何样式的喜剧作品必須具有的特征。我們再重复一句：任何样式的喜剧作品；因为喜剧本身不是样式，而是艺术的一种形式或种类，它本身包括着各种不同的样式——諷刺剧、小品文式喜剧、通俗笑剧、广场剧、趣剧及其他。至于“音乐的”、“抒情的”或是“生活的”这些形容詞，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説明影片的材料和处理方法：杂文式喜剧可以以音乐的材料为基础，音乐喜剧可以是抒情的，而小品文式喜剧也可以是具有概括性的諷刺或具体的日常生活内容的作品。

喜剧的哪一种样式适合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呢？对这样一个問題，我們是有过很多毫無結果的爭執和討論的。有些人坚持說，生活喜剧是最现实主义的，因而是完全适合的。另一些人却認為，我們的任务是揭露那些在我們的生活中还存在着的有害的东西和惡習，所以只應發展諷刺喜剧。照第三种人看来，我們必須有性格喜剧。而那些強調喜剧的功用首先是作为一种玩艺兒来引人發笑的人們，却認為那种由滑稽情节、偶然事故和誤会湊成的喜剧在目前才是最重要的。

以上那一切言論倒的确是建立在誤会上面的。只有“純艺术”，形式主义的、唯美主义的、脱离生活的艺术才会去关心嚴格的“形式純潔”的問題。

在喜剧中，就象在一般艺术中一样，除了枯燥乏味的样式以外，一切样式都是好的。丰富多采的生活現象應該有丰富多采的样式来加以表現，即使在一部作品里，各种不同的样式也都可以

互相交錯，互相結合，互相交替。

艺术家在反映那种在社会主义以前的旧社会制度中所不存在的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在苏联社会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决不可以受到艺术中的那些已有的成规和教条的束缚。当然，喜剧艺术的发展也是有它的规律的，如果破坏这些规律，就会使喜剧性遭到破坏。

大家知道，新的内容是需要有新的形式来表现的。不过在这里应该这样来理解“新的”这个字眼：它不是什么以前完全不知道的、新发明出来的东西，而是对人类艺术发展的过去阶段上已经达到的那种优秀的、先进的、进步的东西增加一些新的特质。

那些应当成为判别苏维埃电影喜剧（它的一切样式）根据的新特质到底是怎样的呢？

首先，对任何一种苏维埃艺术作品所提出的一切要求，都完全适用于喜剧。正象任何其他作品一样，我们的喜剧也应当起着共产主义教育的作用。苏维埃艺术的目的是“帮助在我国社会中的人们身上培养那些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毒瘤和恶习完全绝缘的性格和习惯”①。苏维埃艺术的目的是“抨击那些在社会中仍然存在的恶习、缺点和不健康现象，通过正面的艺术形象来表现具有光辉灿烂的人格的新型人物”②。

所有那些与我们苏维埃社会的共产主义理想发生矛盾的东西，都应当用喜剧的手段加以嘲笑。我们社会的理想和社会上仍然存在的恶习之间的冲突，就是喜剧冲突的基础。

使喜剧有别于其他各种艺术的特点，只在于喜剧是用笑这一武器来实现上述那些目的。要懂得如何利用这一武器，自然就要向过去的经验，向古典喜剧大师们的优秀遗产请教。古典喜剧

①、②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大师們是利用笑这一武器为自己人民服务的良好榜样。

果戈理曾出色地規定了笑的社会作用，他說，笑的产生是为了嘲笑那一切玷辱人的真正的美的事物。他又同样明确地说：艺术就是要抓住新事物的还难以觉察的特点，使它成为人人看得见的东西。

笑有这样两种目的：一方面是表现和揭露反面事物，为的是把它从社会中清除出去；另一方面则表现和支持正面的新事物，为的是使它在生活中肯定下来。

果戈理实际上以这些规定发展了世界进步艺术的优秀传统。亚里斯多德就已看出喜剧在刻画“坏人”方面所具的意义。阿里斯托芬、索福克里斯、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博马舍、莫里哀在自己的讽刺作品和喜剧作品中引出那些“坏人”，并不是为了使他们成为摹仿的对象，而是要通过他们来嘲笑社会的恶习。在许多古典作品中，除了反面人物以外，还有正面人物出现，而这些人物是用来体现他们那一时代的进步思想的。一直为进步和社会正义事业服务的俄国古典喜剧传统就是这样。在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中和萨尔蒂柯夫—谢德林的一些讽刺作品中出现的“坏人”是用来揭露农奴制度社会的恶习的，这些坏人在没有正面人物出场的情况下，起着并不比格里包耶多夫的“智慧的痛苦”中恰茨基小的作用。笑和作者自己（他们从先进的社会思想的立场上真实地描写了他们那一时代的现实生活），就是这些作品中的正面人物。

因而，现在那些批评家和理论家企图解决：在苏维埃喜剧中可不可以只有反面人物出场，是不是一定要有正面人物出场，以及在正面人物中间可以安置多少反面人物（或者反过来，在反面人物中间可以安置多少正面人物）等等问题，他们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穿凿附会，不切实际的。问题只在于真实地反映现实及其辩证运动和革命发展，换句话说，就是反

映我們生活中的各个典型的方面。

典型化——這就是揭示那种應該理解成為我們蘇維埃社會生活中重要現象和發展趨向、而不是理解成為平均數的本質事物。所以，在這裡無論怎樣求助於古典作家都不會有什么效果的。古典作家們是在另一個歷史時代，在另一種社會制度下，在另一種人與人的關係中生活和創作的，並且，主要的是，他們的思想意圖必然要受到那一時代的哲學觀點的限制。

自然，古典作家們不能給我們解答那些與在電影喜劇中反映我們社會主義現實生活中迫切問題有關的根本問題。從古典喜劇中，我們所應該汲取的只是它的進步傾向、為人民服務的高尚傳統和它的藝術原則——在創造性地解決他們所面臨的任務時的高度技巧。古典喜劇家們在描寫自己主人公身上那種彷彿是“一般人有的”情感和熱情——愛情、吝嗇、虛榮、偽善等等的時候，創造出了具有巨大力量的典型形象，揭露了所描寫的現象的社會根源和政治意義。他們善于塑造活生生的、充滿血肉的、有個性的人物形象——這些有血有肉的人同時又表現了某一階級、某一階層、某一社會集團的本質和意願，表現了社會對抗力量之間的利益衝突和思想鬥爭。古典作家們善于按照曲折迂迴的情節去發展故事，忽而讓它發展得很快，忽而把它馬上收住，使讀者或觀眾經常处在兴奋和緊張的狀態中。

這種技巧之所以可貴，就在於它是帶着明確的目的性來處理具有社會意義的重大問題的。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沒有任何一部內容空虛的、消遣性的、‘輕松的’作品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不論它的形式上的價值有多高。在真正喜劇藝術的寶庫中保留下來的，只是那些反映重大問題、揭露生活中的重要現象而且表現出作者的高尚進步思想的作品。

我所以不得不提到這些眾所周知的真理，是因為我們這裡最

近又出現了这样一种倾向，就是对喜剧的要求降低了，只提出一个主要条件，那就是它必須是引人發笑的。同时認為，喜剧只要以苏維埃現實的材料为基础而又不歪曲苏維埃現實，就不会是有害的或無益的。

現在我們就回轉來談談苏維埃电影喜剧的适当發展途徑和它与古典喜剧的区别、尤其是与現代資产阶级电影喜剧的区别这个問題。

在許多不同类型的古典喜剧当中占多数的是这样的喜剧：正面人物——进步的、有思想的人單独同反面环境作斗争，克服那些由于不公平的社会条件、由于在社会中占統治地位的偏見而产生的障碍。只有反面人物出場的喜剧（这里提醒一下，在“欽差大臣”中和薩爾蒂柯夫—謝德林的許多作品中，是連一个正面人物也沒有的），則画出了当时社会的典型圖景，也就是描繪了这样一个反面环境——如果作者把正面人物引到那里面来的話，他是不能不有所行动的。

苏維埃喜剧根本不同于其他喜剧的是：不管剧中人物被賦予多少正面的或反面的因素，剧情終究要在正面的环境中展开；这个正面环境就是我們的苏維埃社会，这社会中的人們在道德上和政治上是一致的，他們有着共同的偉大目标，并团结在偉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周围，团结在全民敬爱的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周围。

任何一个从古典喜剧中机械地搬到这个环境里来的冲突都不可能成立，因为它不符合我們生活的真实。譬如說吧，赫列斯达可夫来到我們某一个城市。即使有某一个人把他当做大人物并且象市長那样跟他周旋，不管怎样，这个赫列斯达可夫想一下子就在一所住宅里同地方党和苏維埃組織的领导者，同衛生、教育、保安等机构的負責同志見面，却是不可能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只能个别地、單独地对他们“做功夫”，并且还要有能够办好非法支付手續的会計主任們参加。这就要求改变喜剧的整个富

于戏剧性的进程，改变它的情节、它的糾葛，更不用說要去改变它的思想意圖了，因为，很明显，“欽差大臣”中所选取的情境只能在另一个社会的条件下产生。

正因为如此，C·米哈尔科夫在喜剧“船”中在某种程度上所采用的“欽差大臣”的情节，是不适宜于创作大型的讽刺作品的。结果所表现的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骗子手的故事，他把一个小小的官僚主义者和在这个官僚主义者所领导的机关内任职的几个鑽营拍馬和粗枝大叶的人愚弄了一番。这个喜剧所以沒有能提高到讽刺性的概括的高度，是因为正面的苏维埃的环境沒有被有力地表现出来（代表这种环境的是汽车司机和几乎完全沒有說話的女秘书）。它只是存在于人物行为的某些细节中，而主要的，是存在于观众的意識中，他們随时都在糾正作者。同时，连斯基①是自己故意假裝成另一个人，而赫列斯达可夫却是不知道人家把他当做了欽差大臣，这就使情况有着本質上的区别：后一种对喜剧說来是有机的，而前一种却只适宜于作为小品文式作品的材料。

苏维埃喜剧中所發生的失败或半失败現象，都正是由于我們喜劇沒有提高到对现实中的重要現象加以概括，对人物——通过他們可以显示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倾向的人物——的性格和行为沒有加以典型化而产生的。同以前的讽刺作品的杰出大师們的創作和理論觀點恰恰相反，我們的剧作家往往縮小了自己喜劇的主题，局限于描写局部的事件，把自己关闭在一定地点和一定人物的相互关系这个狭小的圈子里。譬如說，他們在喜剧中所描写和嘲笑的不是官僚主义的現象，而是一些个别的官僚主义者，不是諂媚和逢迎的習气，而是一些拍馬屁者和無节操的人。順便說一句，官僚主义者不知为什么特別走运。我們在Л·列恩奇的剧本“大肆活动”里，在Н·維尔塔的“波姆別也夫的毁灭”里

① 连斯基：米哈尔科夫的讽刺剧“船”中的主角。——譯者

和其他許多作品里都看到官僚主义者。好象在我們这里就再沒有应当与之斗争的其他反面現象和毒瘤了。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是必須的，不过不應該簡單地把它的一些代表者記錄下来，仅仅在所謂日常生活方面再現它，而應該把它作为阻碍我們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的社会的惡，憤怒地加以鞭撻，突出地表現它，加以典型化，并且消灭它。

我們很多喜剧所由構成的事实和事件本身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被运用着的，然而这一切只有对于小品文式的作品才会显得足够。小品文式作品的力量就在于它的具体性，就在于它的人物和剧情發生地点都是实在的。如果剧本中保持了小品文式描写事件的規模，却沒有确定的人物和剧情發生地点，那么这个剧本就失去了小品文式作品所具有的影响力量，不能获得巨大的社会諷刺效果。瑣碎的事实是不足以創造偉大的艺术形象的。任何一种概括，特別是艺术的概括，都并不是一堆事实，而是从事实的运动和发展傾向，从它們的一切生活联系和間接表現等方面加以分析和研究的結果。高尔基說过，事实还不是艺术的真实。还应当善于从事实中寻取意义，并且作出艺术的概括。“決不能帶毛炒雞，如果拜倒事实面前，只会使我們把偶然的、非本質的东西同根本的、典型的东西混淆起来。应当学会拔掉非本質的事实的毛，应当善于从事实中寻取意义。”必須从很多事实中選擇最典型的东西来創造艺术的形象，这形象本身就反映着帶有一定傾向也就是帶有政治目的的一堆事实。

苏維埃社会的最高目的是建設共产主义。因而，每一部任何样式的喜剧片，在主題和材料所提供的可能范围内，归根到底都應該为这一目的服务。自然，那种直接揭示生活中的重要現象，直接地（而不是間接地）解决我們生活中的一些主要的、关键性的（而不是次要的、侧面的）問題的喜剧，是最能起作用的，因而对我们來說也是最为重要的。

喜劇創作的總方向已經由馬克思大致規定好了。他指出：歷史本身的進程把陳舊的生活方式變為喜劇的對象。“歷史一貫地運動著，並且經歷著許多階段，然後才把陳舊的生活方式帶進墳墓。世界歷史形態的最後階段是它的喜劇……歷史為什麼這樣運動呢？就為了使人類笑着同自己的過去告別。”^①

“陳舊的生活方式”和想要使這些方式不至於受到徹底破壞的那一切企圖，就是在藝術中用引人發笑的、喜劇的方式來反映的對象，就是喜劇的材料。

“毫無疑問，笑——這是最有力的破壞性的武器之一……笑摧毀了偶象，摧毀了花冠和鏡框，因而使得美麗的聖象成為一幅發黑的、畫得十分拙劣的圖畫。”（赫爾岑）笑——這是對現象的評價，笑——這是非難和譴責的表示。

但是，同陳舊的生活方式進行鬥爭，是为了肯定新的、比較完善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見，笑的功用不只是破壞舊的，它也建立新的。

順便應當指出，我們通常所說的只是對舊時代殘余的鬥爭。但是，生活在前進，在發展，新的關係在產生，同時還出現著過去所沒有的新的錯誤，對這些錯誤也是應該進行鬥爭的。

笑——這不是喜劇的目的，而是它的手段。利用笑的那種無往而不勝的力量，應該是为了使人們容易擺脫掉舊的心理，擺掉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桎梏，並加速向共產主義的勝利前進。

要擺脫掉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桎梏，只有用崇高的、光輝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來與之對比，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說，只有當喜劇通過自己的結構、衝突、情节、劇情發展反映出我們社會主義現實的真實的時候，它才可能完成自己的最重要的任務。所以我認

① 馬克思：“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導言”（譯文參見人民出版社1955年中譯本第九頁。）——譯者

为，使反面事物与正面的环境隔离，仅仅突出表现反面事物，而不把它与我們現實中的主导力量来作对比，这是苏維埃电影喜劇中的一个原則性的錯誤。

这并不是說，反面人物在剧終一定要得到改造，或者，万不得已时，由国家保安机关或檢察机关加以逮捕。不是的，对于还在活躍、还很猖獗的惡，应当是这样来表現的——动员觀眾同它斗争，甚至还暗示出这个斗争的道路。但是很多問題应当由觀眾自己去解决和判断。应当只支持那些导使进步力量获得胜利的社会發展傾向。唯有这样，苏維埃电影喜劇才能够实现自己积极的教育任务。

不仅如此，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也应当成为以快乐的、活潑的方式来反映的对象，也就是成为喜劇的对象。这一类型的喜劇应当肯定那些在我們社会生活中天天都在誕生、成長和勝利的新事物。我們的喜劇是建立在对新的、进步的事物的真实描写的基礎上，是与对待一切阻碍我們社会發展的东西的那种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相結合的。

可以說，实际上也不会有誰来反对这些众所周知的、不只說过一次的真理，因而，沒有必要来加以重复。的确，無論是在报刊上，在大会上，在會議上，誰也沒有反对过这些論点，甚至相反，全都“拥护”这些論点。可是我总覺得，我們的艺术家在自己的具体創作实践中，多半沒有从这些正确的、在理論上他們也贊成的觀点出發。所以在应当做的和实际做的事情之間就有了不協調的現象。

* * *

正在成長的新事物同衰頹着的、但仍不甘心灭亡的旧事物的斗争，这就是我們所有剧作的冲突的基础。由于情节是通过人物性格的冲突表現出来的，所以只有当这一冲突是通过人物性格的可笑的一面，通过人物相互关系的可笑的一面表現出来的时候，

它才可以采用喜剧的色彩。任何一种生活冲突，只要它不是以悲剧性的收场来结束的话，都可以通过喜剧的三棱镜来看，它是不至由于这个缘故而失掉自己的社会意义和尖锐性的。

正因为如此，就没有必要给喜剧寻找某一些特殊的冲突、障碍、误会。譬如说，为什么要构思出这样一个集体农庄主席的“形象”①——他不近情理地禁止自己农庄的最优秀的女生产能手嫁给另一个农庄的很好的小伙子，而只有当这个小伙子赛马赢了，才答应嫁给他，——这是为什么呢？

从细小的抵触中去寻找冲突是不对的，在我们的喜剧中，这些小抵触的参加者通常是一些小官僚主义者、房屋管理人和不高于企业经理和研究所所长的领导者。当然，问题并不在于人物职位的大小，不在于身上有官僚主义的人和对一切漠不关心的人起碼都得是省一级的领导者或者是某一个部的领导工作者，问题在于重大的冲突不应当通过人物的一些细微末节的地方，而应当通过他的本質的表现而显示出来，只有这些表现才符合于作者所要攻击的那一現象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作者借口某些編輯机构或接受剧本的机构中有人这样教他们去做，他们竟不是从确定占据在他们创作想像中的思想意图和重大主题开始，而是从猜测自己未来作品的主人公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他选择哪一种职业，对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加以嘲笑可以被容许到什么“限度”等等开始，来进行自己的创作。

这种做法，可以说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喜剧并不是嘲笑某种职业和它的代表者，而是嘲笑任何人可能具有的性格特点，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

“的确，嘲笑那些看起来是可笑的东西并非罪过。”不仅如

① 这里指的是“摩班哥萨克”中奥雅一角。——译者

此，还应当嘲笑一切值得譴責的东西。不要害怕嘲笑那些我們今天看来还很不少、还很流行、还有力量的，而實質上是屬於过去的、已經活过了時代的現象。笑——这是力量的标志。如果我們嘲笑这些現象，那就是說，我們已經超过它了，已經走在前面，我們并不怕可笑的对象，因为我們知道，它在历史發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敗。

艺术作品的創作是从作者根据丰富的生活觀察而形成主題开始的，是从公民——艺术家明确了他的創作工作的任务、方向和社會意义开始的。喜剧的“特性”并不能更改这个一般的創作原理。喜剧家不能从想出某些可笑的情节、噱头、滑稽效果等等开始工作。在电影喜剧这一形式中，寻找表达作者意圖的手段，应当从理解由生活中汲取来的冲突，用喜剧的形式处理典型性格和人物形象开始。

* * *

現在，关于制作喜剧短片的問題已經提到日程上来了。这种喜剧是有充分权利存在的。

不管喜剧短片中所处理的主題是怎样帶有地方性，不管它的材料是怎样局限，剧情的規模是怎样狭小，它都不可以离开苏維埃艺术的大道而存在和发展。如果不适合在寬闊的干線上奔馳，那么它可以并且应当在公路和土路上走，甚至在小路上走，不过这些路要跟具有国家意义的大道平行，并且要經過同样的站口。

小喜剧应当建筑在大主題的基础上，不过这主題的規模應該是作品的容量所能承受的。喜剧短片的小容量应当利用得特別巧妙、确切和細致，就象优秀作家們利用短篇小說这一样式似的，那里面有时容納着一个处在压缩的状态下的主題，它如果發展起来就足供長篇小說之用。

遺憾的是，我們的小喜剧样式处理得非常差。这也許不可能很快就获得巨大的成就。但是，正是为了开辟通向更大胜利的道